

湖南长沙望城区铜官战国墓群发掘收获



2024M29头盆器物特写



2017M37平面形制及随葬器物

为配合望城经开区铜官工业园项目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于2017年、2024年在项目用地范围内发掘了一批墓葬、灰坑、陶窑等遗迹。其中墓葬98座，以战国墓为主，共计95座(2017年发掘68座，2024年发掘27座)。两次发掘地点直线距离约600米，分布于湘江东岸一线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的低矮丘陵的山脊之上，距离湘江的直线距离约500~600米。

发掘概况

2017年项目用地面积约19万平方米，共发掘墓葬68座，窑址、灰坑各1座，主要分布于三个丘陵岗地的顶部区域，海拔48.2~60.3米。68座墓葬中明墓2座，战国墓66座，其中有6座因未出土遗物，根据形制结构推测可能为战国墓。共出土陶器、铜器、铁器、玻璃器等各类遗物共计400余件(套)。

2024年发掘面积约为45000平方米。发现墓葬30座(发掘29座，一座近现代墓未发掘)，坑2座，分布于东西两个丘陵岗地的顶部区域，顶部最高海拔在60米左右。西区发掘战国墓4座，其余均位于东区。29座墓葬中战国墓27座，晚期墓2座。出土陶器、铜器、铁器、玻璃器等共计110余件(套)。

墓葬形制、器物组合

根据墓坑的宽窄可将其大致分为宽坑墓(24座)、窄坑墓(62座)和狭长坑墓(3座)三类，因墓地所在区域地质地貌为酸性较强的第四纪网纹红土，具有较强的腐蚀性，墓内葬具及人骨均已腐朽不存，一般墓内仅存有棺槨痕迹、枕木沟和随葬器物等。随葬器物组合主要分为仿铜陶礼器和日用陶器两类，以仿铜陶礼器为主，日用陶器墓仅7座，未出土随葬品的“空墓”8座。

陕西西安长安区贾里村墓地考古新发现

2022年1月至2024年4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配合长安区贾里村棚改项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工程建设范围内所涉及的遗址、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清理墓葬1240座，灰坑2295座，其他134处(沟64条、窑址27座、井43眼)，涉及年代自西汉早期至清代晚期，出土文物近4000件组。

该项目位于长安区神禾原(原)北部最大村落——贾里村，项目占地面积超400亩，由四大块方形区域组成，整体呈田字形。地缘北邻神禾二路，西邻常顺街，西距名刹香积寺约2.5公里。此处为神禾塬(原)北麓坡地，整体由东北向西南缓降，立足于此，可北望长安城，南瞻秦岭山脉。东北坡顶多集中西汉墓葬，中部多为唐代墓葬，西南多为东汉墓葬，遗址中南部集中为宋金时期灰坑。

主要收获

汉代墓葬

汉代墓葬中，在其中20座墓葬中发现有陶壁随葬现象，多者达六件，少者仅一件。在清理墓葬过程中，发现其均分布于棺周，排列有序。随葬六件陶壁者，一般为棺前一件，左右各两件，棺尾一件。同时发现一件悬于淤土之上，疑似跌落所致。所以通过其现场分布状态，结合各墓葬出土情况，初步得出陶壁为此处汉代居民装饰棺槨之用的结论。

唐代墓葬

发现盛唐玄宗董贵妃之亲族董氏家族墓，出土八方石刻墓志，确认该墓地以祖董彻墓(M1182)为祖塋，至少存在祖孙四代人，由南向北，从祖至孙，逐辈排列。通过对该家族墓群的发掘有如下主要收获：

董彻，亡于690年，葬于691年正月，其墓为砖室墓，损毁极其严重，出土大量唐三彩，与目前已知中最早的李晦墓(689年)唐三彩，时间最接近，为研究关中早期唐三彩提供了大量材料。

家族墓范围内共出土5件高足鬲刻银杯，3件发现于董氏家族纪年墓。这在我国唐代考古中尚属首次集中发现如此大量的高足银杯，为研究唐代高足银杯提供了稀有的纪年标本。

重孙董韶容为唐朝名相张九龄之妻，结合史料及志载知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四月廿日，张九龄被贬，远赴荆州，董



▲ M1182出土遗物



▲ 高足杯

▲ M235出土遗物

► M1出土遗物

典型墓例介绍

宽坑墓 2017CWTM37，平面呈“甲”字形，为带斜坡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160°。开口于现代表土下，距地表深约70厘米，向下打破生土。墓道位于墓室南端略偏西，底面呈斜坡状，长350厘米，宽120厘米，底端距墓底深约238厘米。墓口长252厘米、宽168厘米，底部长252厘米，宽154厘米，深464厘米。四壁规整微弧，略向墓室内凸出。墓室南壁留有3个半圆形脚窝。东西墓壁底部两端分布有两两对称的枕木槽，开口宽32~38厘米，高24~34厘米，进深4~12厘米。出土器物12件，除一件残碎琉璃壁出土于墓室内南端底部填土中外，其余11件陶器分布于墓室底部西侧，器形有鼎2、敦2、壶2、豆2、勺1、匕1、盘1。

2024CWTM2，为南北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190°，原始墓口已被破坏，现存墓口尺寸与底部一致，长约270厘米、宽150厘米，残深约140厘米。墓壁较平直，墓底四角呈方形，平底。墓内填土为棕红色粉砂土，土质较疏松，未发现夯打痕迹。墓室南壁发现脚窝2个，西壁发现脚窝1个，直径约15厘米。墓底发现两条东西横向枕木沟，长约170厘米，宽约34厘米，深约10厘米。墓室底部出土器物9件(套)，包括铜剑1、铜带钩1、铜砧码1套、陶鼎、陶敦、陶壶各2件。

2024CWTM11，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199°，墓内填土为红褐色粉砂土，土质较疏松，未发现夯打痕迹，系原坑回填。墓壁陡直，口底等大，墓口长约264厘米、宽140~164厘米，深282厘米，墓底发现两条横向枕木沟槽，北长156厘米，宽28厘米，深8厘米；南枕木沟长166厘米，宽16~24厘米，深8厘米。椁痕长约200厘米、宽124厘米、厚6~8厘米，残高26厘米。墓底西侧出土陶器8件，包括鼎、敦、壶、豆各2件。

窄坑墓 2024CWTM29，为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120°，墓内填土为红褐色粉砂土，土质较疏松，未发现夯打痕迹，墓内东部填土中出土铁钺1件。墓壁陡直，口底等大，平底。墓口长240厘米，宽84~88厘米，深192~200厘米。距墓口深约140厘米处在墓壁四周留有生土二层台，宽约6~28厘米。墓底东端设有一平头瓮，长约40厘米，进深26厘米。头龕内共清理日用陶器3件，包括陶豆2件、陶高领罐1件。

狭长坑墓 2024CWTM15为南北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210°，墓内填土为棕红色粉砂土，土质较疏松，未发现夯打痕迹。墓壁较平直，平底。墓口尺寸与底部一致，长约220厘米、宽70厘米，深约95厘米。墓室南壁距墓口约80厘米处发现1个高头瓮，形制不甚规整，长约46厘米，宽约20厘米，进深约16厘米，瓮底距墓底约25厘米。龕内出土日用陶器2件，包括陶罐、陶豆各1件。

初步认识

布局与年代 铜官战国墓群是近年来长沙城区外围发掘的一处分布集中、面积较大的战国墓群，两次发掘区均可划分为相应的墓区，墓葬分布有序，应是经过系统规划。墓葬形制和出土陶器组合具有典型楚文化特征，同时部分细颈盘状口壶和个别矮颈折肩折腹罐的出现表明墓地所属人群受到了秦文化的影响。从出土典型器物形制分析，铜官墓群主体年代为战国晚期，下限可至秦代。此外，也有个别墓葬在随葬楚式仿铜陶礼器组合的同时件出越式扁茎铜剑。

墓主的身分与等级 本次发掘墓葬墓室规模普遍较小，以窄坑墓为主，宽坑墓次之，狭长坑墓仅有3座，出土器物组合以仿铜陶礼器(1~2个)为大宗(占比84.2%)，对应的墓主身份等级以平民为主，个别可能为低等贵族，少量出土日用陶器和未出土随葬品的“空墓”对应的墓主身份等级大致为贫民。

对应居址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查阅以往文物普查资料发现，墓地周围并未发现有同时时期的战国居址分布的线索，这批战国墓群对应的聚落居址问题，有待通过将来的考古工作继续探索和确认。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执笔：曹栋洋 赵今 赵玉川)

祝家庄遗址位于青岛市黄岛区珠海街道祝家庄村东。遗址地处两山间的冲积平原，南望大珠山，北倚铁嶺山。该区域地形平坦，矿产(特别是铁矿)与水资源丰富，风河、南河于遗址东侧交汇。前期调查表明，祝家庄遗址是风河流域已知面积最大的聚落，时代自新石器延续至明清。

祝家庄遗址曾进行过3次考古工作，2012年发现3组战国至汉代的陶排水管道遗迹，首次揭示其存在较高等级建筑。近年，邻近的安子沟、土山屯、王家楼等汉墓群的发掘，深化了对遗址的认识。遗址南约25公里的琅琊台遗址考古成果显示，其不仅是秦汉离宫，亭子兰地点的战国长廊遗迹亦为齐国经略此地的证据。祝家庄出土的战国素面、卷云纹半瓦当及西汉“千秋万岁”瓦当，与琅琊台所出高度一致。遗址周边还出土著名的“陈氏三量”(“子禾子釜”“陈纯釜”“左关卿”)等战国重器。以上证据，均表明铁嶺山东麓的古琅邪地区在战国时即为齐国重地。

2024年3月至2025年1月，为配合沈海高速改扩建，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联合西海岸新区博物馆对项目占压区进行考古发掘，发掘区域位于线路两侧向外拓宽部分，面积3000平方米，沿高速公路走向布设探方37个，清理遗迹696处。现将此次发现的建筑基址、手工业遗存等重要遗迹和遗物做简要介绍。

地层情况

- ①层：耕土层黄褐色沙土，内部树根、塑料薄膜较多，厚约0.3米。
 - ②层：明清时期文化层，黄褐色沙土，较纯净，厚约0.1米。
 - ③层：汉代文化层，浅灰褐色沙土，有大量灰陶片和红烧土颗粒，厚0.2~0.4米。
 - ④层：战国—汉代时期垫土层，黄棕色风化沙土夹杂少量黑色淤黏土，断续不连贯，主要是位于建筑遗址区北侧，可能是地面平整时的垫土，厚0.15米。
 - ⑤层：战国时期文化层，灰褐色沙土，内部少量灰陶片、红烧土颗粒，厚0.15~0.25米。
- 以下为风化基岩层，西周至春秋时期遗迹均开口于⑤层下。

遗迹和遗物

本次发掘揭露一处规格较高的战国至西汉时期建筑基址的局部，含基槽、碌墩、房址、排水系统等，并发现与金属冶铸、陶器烧造相关的手工业遗存。建筑基址周围还发现壕沟、灰坑、水井和墓葬等。

建筑基址

建筑基址主要分两期。一期建筑基址位于④层上，发现不连贯的夯土，夯层较薄，为黄色砂岩颗粒混杂黑色淤黏土，部分生土亦有简单夯打。夯窝直径7~10厘米，推测使用金属平底夯。未见铺地砖。建筑构件堆积以西汉“千秋万岁”瓦当为主，辅以板瓦、筒瓦、瓦钉帽等。建筑相关遗迹主要有基槽、碌墩和排水系统。附近灰坑等遗迹中亦见较多战国素面、网格纹半瓦当和云纹圆瓦当。④层上发现数道车辙，表明其为当时活动面，结合出土陶器及“半两”钱币，推断一期建筑基址时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

二期建筑基址位于③层上，发现小段铺地砖(菱形格纹方砖，一侧立砖封边)及大量残破、烧红的建筑构件。因近高速公路施工区且上覆地层薄，农业活动破坏严重，遗存保存不佳。地层中另见菱形格空心砖残块及西汉中晚期原始青瓷甗残片，推测二期建筑基址时代为西汉中晚期。

基槽 基槽数量较多，均为东西和南北方向，宽度较窄，内部填土部分经过简单夯打，土质为灰褐色沙土夹杂少量的灰陶片、红烧土和草木灰等。部分基槽内及两侧发现有圆形的柱洞。

碌墩和柱坑 共发现碌墩36个，平面方形，垂直开挖方形基坑后由下至上夯筑。规格与开挖深度各异。西侧两处相邻碌墩规格较大，边长约2米，基坑深，底部生土亦有夯打，逐层夯筑，夯层见密集夯窝(直径7和10厘米两种)。夯层中上部埋置方形石块为柱础，承托木柱，四周再以土夯实至基坑顶。木柱已烧毁，仅余圆形柱洞，内多红烧土痕迹。中型碌墩规格约1.5米，一般仅基坑内有夯层，未见础石。柱坑规格较小，略呈圆形，无夯土，内填较大鹅卵石为础石。因发掘区域所限，碌墩和柱坑形成的柱网结构尚不明确。

排水系统 发掘陶水管道的4处，结合2012年东侧发现的3组，建筑基址周围至少存在7组陶水管道。各组管道的单体陶水管形态、规格(夹砂灰陶，外饰瓦棱纹、绳纹，长65~70、直径30~33、厚2~3厘米)一致，应属同期。套合方式均显示为建筑基址向外排水。此7组管道共同构成该建筑的排水系统(图1)。

排水管道均开口于④层上，建造方式为平地开挖沟槽后内置陶水管。分双管道型和单管道型：双管道型直接将陶水管埋于较深沟槽底部；单管道型沟槽较浅，陶水管两侧及上部用青砖(素面长条砖或方形铺地砖)呈“U”型防护。二者分布亦有别：带护槽的单管道主分布于建筑基址西侧，无护槽的双管道主分布于东、南侧。

值得注意的是，单管道上层护砖裸露于开口层面，而双管道沟槽开口于④层之下，埋藏较深。据此推断单管道为明渠，双管道为暗渠。

出土遗物 建筑基址上层发现较多建筑构件堆积，主要为板瓦、筒瓦、瓦钉帽和瓦当。部分板瓦、筒瓦呈倒扣状，应为建筑倒塌后堆积。瓦当分半瓦当与圆瓦当，绝大多数为西汉“千秋万岁”文字瓦当。地层中亦见铺地砖、空心砖(表面压印同心菱形格纹)。建筑基址周围灰坑、沟内发现一些战国素面、网格纹半瓦当及卷云纹圆瓦当(图2)。此外，出土较多陶器(罐、盆、甗、豆、盂、碗、瓮等生活容器)和钱币(半两、五铢)。另有一定数量铁器、铁渣和铁矿石。

冶铸、制陶业相关遗存

建筑基址南侧发现与金属冶铸、制陶业相关的遗存。虽未发现窑炉等典型设施，但出土了非常丰富的金属冶铸石范、垫圈和烧流陶器，表明该区域与此二类手工业密切相关。

遗迹 房址(F11)处，方形，有隔间，门道朝南。基槽窄，内填灰褐色沙土，较紧密，无明显夯筑，南侧基槽见柱洞6个。房址内多陶容器残片，部分有烧变形迹象。F11北侧发现一批与冶铸、制陶相关的灰坑，以H346最为典型，内出较多石范和垫圈。

遗物 陶片种类包括罐、盆、甗、盂、盒、豆等生活器，另有大量烧流化、鼓泡的陶器残片。垫圈分两种：一为规整圆形圈，断面方形或平行四边形，外壁素面或压印粗绳纹，系陶辅助工具。另一种为敞口陶器型，形态近宽沿盆的沿或肩部以上，下部有磨平迹象，或为陶容器改造。青岛台头遗址战国至汉代陶窑窑床中曾发现较多此类垫圈，并与圆底器共存，可知其为烧制过程中的窑具。



图1 建筑基址排水系统



图2 战国秦汉时期瓦当

石范均为金属农具范，砂岩质为主，少量滑石质。一面平整光滑，有铸造农具的型腔，内残存黄白色脱范剂；背面粗糙，留有多处金属凿痕。附近灰坑出土阴刻大篆“铁货”字样石范。

建筑基址周围的遗迹

壕沟和沟状遗迹

发现壕沟1段，位于建筑基址北侧，较宽，剖面呈“U”型，两侧有台阶状开挖迹象。壕底层堆积为灰褐色淤沙，夹杂少量陶片。沟内上层堆积中发现大量弃置建筑构件，主要是一些破碎严重的板瓦和筒瓦。另外在壕沟北侧发现数量较多的沟状遗迹，均为东西—南北走向，长条状，剖面呈长方形，沟内的堆积均为灰褐色淤积土，较为疏松，未见明显夯打迹象，出土遗物也较少，性质有待待进一步了解。

灰坑

祝家庄遗址发现灰坑数量较多，打破关系较为复杂，但大多较浅，形状不甚规则，出土遗物也不甚丰富。在一些灰坑和灰沟中也能发现数量较多的素面和网纹半瓦当，形态与琅琊台遗址亭子兰地点出土同类型器物形态几乎完全一致。少量素面、网纹半瓦当，云纹圆瓦当，包括一些卷云纹瓦当。其中发现的战国灰坑H35，圆形，形状较为规整，内部发现较多完整的陶器、铁器和铜器等。堆积形态可分两层，上层陶容器和金属器较多，其中陶器主要包括陶罐、壶、豆、量器等，其中陶量上发现有印文“□廩”，表明该处附近应有粮食存在。铁器数量较多，但锈蚀严重，能辨识的器型主要有削刀、铁农具等。铜器包括铜戈、矛、削刀、刀和双面锯等，发现的铜刀币主要为齐地铸造的明刀，数量较多，堆积在一起，铸造较为粗糙，锈蚀严重。下层器物主要为陶管和板瓦，形态较为完整，其中陶管形态和建筑基址内的排水管存在明显差异，但与同时期冶铁遗址中使用的鼓风管(河南南阳北关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存在较大相似性，故不排除是冶铁遗迹鼓风管的可能性。

水井

水井群主要集中在分布在北侧，中部建筑基址区也有一定数量分布。井口分直口和喇叭口两种形态。部分水井井壁加固，加固方式分陶质井圈和砖质井圈两种，砖质井圈使用青砖垒砌，青砖多为残破的花砖，砖侧面的纹饰为连续同心菱格纹，“大吉”文字砖等。陶质井圈表面装饰有细绳纹，两侧均有圆形开孔。

墓葬

墓葬共发现10座，零散分布。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均为小型墓，人骨保存不佳，随葬品极少，仅发现青铜剑1柄。另发现少量瓮棺葬案例，均为两个夹砂陶罐互套合状态，人骨保存不佳。另外发现西周晚期墓葬1座，出土随葬品有夹砂灰陶甗、陶罐等，人骨保存也不佳。

小结

本次发掘显示，祝家庄遗址年代最早可溯至西周晚期，主体为战国至西汉建筑基址。该基址含体量较大的基槽、碌墩、排水系统和壕沟等，结合瓦当、钱币及周边琅琊台遗址情况判断，建筑基址主体应属西汉。然灰坑、水井等遗迹中发现不少战国素面、卷云纹半瓦当，且遗址改建迹象不明显，表明其或始建于战国，西汉沿用，甚至可能是战国建筑基础上增补发展而来。从建筑规模、等级看，祝家庄遗址在战国至西汉时期应属区域内县级核心聚落。

建筑基址南侧发现大量与金属冶铸相关的遗存，表明该区域内存在铁质农具冶铸业，石范上的大篆字体是典型齐地流行文字，表明祝家庄遗址的金属冶铸业可能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祝家庄遗址西侧约2.5公里处便是铁嶺山，据《胶南县志》记载，山中至少存在5处铁矿分布点，近期开展的铁嶺山东麓区域系统调查发现，在石人泊村北的山谷中发现2座冶铁窑炉遗迹，通过对窑炉炉壁进行释光测年显示，年代为距今2000年前后的两汉时期，石人泊冶铁窑炉很可能是对采自铁嶺山中的铁矿石进行初步炼制之地，祝家庄遗址是将石人泊炼制的铁制品进一步铸造、锻造成铁农具的场所。值得注意的是，祝家庄冶铁遗存中还并存大量陶器烧制遗物，表明祝家庄冶铁遗址兼营陶容器和建筑构件的烧制，陶窑可能兼具铁器热处理功能。《汉书·地理志》：琅琊郡，户二十二万八千九百六十，口一百七万九千一百，有铁官。结合发掘出土遗迹的规模 and 等级，祝家庄遗址有可能为琅琊郡铁官治所所在地。

受限于本次发掘面积，对祝家庄遗址揭露和认识并不全面，也导致目前对发掘区内许多遗迹性质的辨认存在证据链不足的缺陷。未来期望在本次发掘基础上，继续开展调查勘探与发掘，以期获得更全面的认识。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 青岛市黄岛区博物馆 执笔：彭影 慕高华 吕雅婷 何昊 郭光义 翁建红)

山东青岛祝家庄遗址发现战国至西汉时期建筑基址与手工业遗存